

交通乱象，是城市文明的伤疤。近年来，上海等多座城市进行交通大整治，交通秩序有了很大改善，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都明显减少。然而，乱象犹存，伤疤仍有。拿闯红灯来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是违法的，却还有一些行人与骑车人在路口明知故犯，不顾红灯止的信号，扬长而过。为了有效改变这一情况，各地都在不断加大宣传与惩处的力度，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招数，电子警察早已上岗，湖北黄石大冶市近日还借助科技力量在市区一个路口处设立了“喷水”装置，行人一旦闯红灯，装置会喷出一道水雾，并语音提示行人不要通行。所有这些，都在于切实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与道德意识，这是消除交通乱象，改变“中国式过马路”陋习的根本之道，应予充分肯定。

不过，交通乱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中的道路交通指示标志设置不尽合理有关，近日，《三湘都市报》就以文配图的形式，报道了长沙市湘江北路银盆岭大桥北段，固定在灯杆高处的交通指示牌显示此处机动车可以在路中间掉头行驶，实际上这里路中间被一道矮护栏隔离，前面还设置了一块禁止掉头的标示牌。这种互相矛盾的交通标示，在上海也有。因此，整顿交通乱象，在着重向民众中各种违法的交通陋习“开刀”的同时，也要大力改进交通管理设施方面存在的“短板”。这就是说，在重点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也不可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

话回到闯红灯的乱象，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行人、骑车人与驾车人缺乏法治文明素养所致，但有一个调查，竟有27.9%的人认为是由于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一比例也许有些夸大，但过马路时，确有不放弃绿灯去选择红灯的情况。比如，我住处附近有条丁字路，三面的人行横道线均紧贴着路口，几乎连在一起，绿灯一亮，大转弯的车辆立马就冲过来，行人根本无法走过去。而大转弯的车辆又特别多，直行的车辆却相对较少，这样在红灯亮时，大转弯的车不能开，直行的车又没有，过马路反而安全，造成了这里更多的“红灯行，绿灯止”的不正常情况。在这里，倘若将三条人行横道线都向后拉一段距离，再严格推行“车让人”的规则，能在绿灯时安全过马路，就不会再有人去闯红灯了。

此外，有的路口红灯时间过长，超过比较合理的90秒的大限，有的红绿灯切换时间，与马路宽度、人车流量相比不合理，都是诱发闯红灯的原因。我住处附近还有一个马路口，有红绿灯，却没有人行横道线，只让车行，不让人走。人要到对面，需绕一个大弯子，过三个路口，这样，也就出现违规者。所以不让人走，本是由于安全考虑，因为马路对面是一个高架下匝口。不过，我想，如果不采取这样“禁”的做法，而是采用“导”的方法，在路口修建一个简便的天桥或地道，不是既给了市民安全，也给了市民方便吗？

有个故事说，人们在食堂就餐，用勺子在菜桶里盛汤，盛汤后，应当把勺子挂在桶边，可有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将勺子往桶里一丢，勺子往往滑到菜汤里去，很不卫生。对此，人们提醒盛汤者要注意公德，不要乱放勺子。确有效果，但却难以完全避免。后来，食堂师傅将勺子换成了长柄，长度大于桶高，滑到菜汤里的现象很少再发生了。此事告诉人们，勺子经常滑到菜汤里，并不完全是用餐者的素质问题，与勺子柄过短有很大关系，也要在管理方面找找漏洞，补补漏洞。闯红灯现象的存在，固然源于人们的文明素质与法规意识的缺失，但也往往与管理上存在“短柄勺子”有关。为了切实做到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明出行，在大力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和遵守交通法规意识的同时，也要积极解决管理上存在的这一“短柄勺子”即“短板”问题。不少城市在交通大整治中，把改善交通管理也列为一项内容，鼓励市民对不科学不合理的交通指示标志设施提出意见，积极改进“短柄勺子”，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赏。

1941年12月8日凌晨，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四川路腾凤里4号，母亲起来小小说：“又出什么大事情了！”

早晨起来，外面马路上人声喧闹，说日军偷袭珍珠港，昨晚黄浦江上一艘意大利邮船自沉，不愿被日军征用。同时听说虹口的日军马上要进租界。



我在家里马上把进步书籍送到厨房，特别是给倪海曙老大哥出版，一批刚印好的他的著作《快字新编》存书，请大厨德荣表叔当果火烧掉。

果然，十时许虹口的日军就进租界。我偷看弄堂口的马路，只见马路两边各站着一排日本兵，他们一个一个隔开点，脸对房子，刀出鞘，坦克车等在这两排日本兵之间于马

伊莎贝尔·于佩尔在法国影片《将来的事》里，扮演一个哲学老师，你可以看到，她在讲台上讲解哲学，和学生们讨论哲学命题，甚至在公共汽车里，在乡村的草地上，随手都会拿出一本哲学书来阅读。这个叫娜塔莉的老师，家里的书橱中，全是各类哲学书，她的丈夫汉斯也是哲学老师。

这部电影，提到许多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以及许多哲学名词，比如卢梭、叔本华、阿多诺、齐泽克、列维纳斯，比如经验批判主义和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等。当然，还有许多台词，都涉及哲学。不要以为这是一部枯燥、深奥和晦涩的电影，事实上，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电影，配上法国美丽的风景和音乐，它叙事流畅、剪辑得当，只是所叙述的内容，和哲学、精神、知性有了紧密的联系。

娜塔莉人过中年，信奉的是哲学和生活同流，思想和现实契合，不希望生活有一个重大的变

四月的申城，伴随着春风春雨的滋润和温度的升高，便迎来紫藤花盛开的季节，紫藤的温馨浪漫与其他颜色的鲜花和变色树一起，奏响了一首五彩缤纷的交响曲，构成了一幅灿烂亮丽的春天画卷。

位于嘉定城南博乐路环城河畔的紫藤公园内一片“令世界窒息的美丽”，据称，这里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座以紫藤为主题的公园之一，近30个品种，从紫蓝到洁白等各色都有，占地面积为1.4万平方米。

春阳高照晴方好，吹面不寒杨柳风。一座座钢架搭起的棚廊下，一串串、一簇簇硕大的花穗，有白色的，紫色的，粉色的，还有紫中带蓝的，宛若晶莹的珍珠，悄然绽放，在灰褐色如龙蛇般蜿蜒的枝蔓上轻轻悬挂，款款垂下，微风吹拂，摇曳生姿，绕园喷芳。据称，紫藤主要有三大类，即中国紫藤、北美紫藤和日本紫藤。紫藤的美丽在于花穗长度，一般的花穗长度为15-30厘米之间，花期为10天左右。而生长在嘉定紫藤园内的花穗，由于优良的生态自然和水土资源等舒适环境，加之优质的品种和精心培育，以致最长的花穗能达到100厘米。花期自4月中旬起至5月上旬，那热烈、灿烂、缤纷绚丽的色彩透着阳光显得更加晶莹

路上开过。从此，上海的孤岛日子便结束，进入日军侵占整个上海的敌伪时期了。

接下来花样就多了：收音机要送到四川路卜内门洋行那里拆掉短波并登记，设立自警岗、户口登记，等等等等。当时我是地下工作者，出版工作于是暂时停顿，隐蔽起来。

一转眼，七十多年过去了。

化，但往往事与愿违，她和母亲的关系，她和丈夫的关系，她和得意门生的关系——电影中这三大关系的变化，影响了她日常和精神生活的走向。

娜塔莉的母亲独居、具有老年精神病症，有时，一天要打给娜塔莉无数次电话，不是说睡不着，就是说想自杀，在被送进养老院后不久跌倒昏迷去世。电影在表现这对母女关系上，波澜不惊，却感人至深。女儿只要母亲需要，就会赶到她的身边；而母亲也依赖女儿，在养老院不吃不喝，见到女儿就喊饿……母亲去世后，娜塔莉有一段深情表白：“她一辈子都在受苦，有种被遗弃的焦虑，她没上过什么学，这是她最大的遗憾，是她强迫我上的大学，然后变成老师，她非常骄傲女儿是哲学老师。”此时，扮演娜塔莉的伊莎贝尔·于佩尔，眼睛里有泪水。

娜塔莉和丈夫看起来很合得来，一起生活了25年，可有一天，丈夫说，他有了另一个女人，要搬出去住。面对如此变

紫藤浪漫香满园

剔透，仿佛一处气势恢弘的彩色隧道，演绎着超凡脱俗的妙境花影。

沿着廊道一路走去，便来到河岸边塑胶铺设的健身步道，这里游人如织，观景赏花，人头攒动。一眼望去，那温馨浪漫的紫藤花与碧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那日式风格的石头灯笼与园内种植樱花、玉兰、红叶李、海棠、桂花、腊梅等植物以及凉亭、小桥、石凳，还有护城河的亲水平台，周边一幢幢别致的民居组合成相得益彰的佳配衬托，和谐雅致，相映成趣。漫步其间，可听林间鸟语，可闻草木芬芳，可观水面鱼跃，饱览湖光水色，呼吸清新空气，欣赏着这番风光旖旎

上海市日本学会成立于1985年9月。我是它的第一届会员。1993年起，我从担任秘书长开始，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这些年来，上海日本学界的同行一直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就是如何贯彻汪道涵老市长的指示，弘扬海派日本研究的精气神。

1989年至1990年，我在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担任客座研究员。NIRA理事长、前国土厅事务次官下河田淳告诉我，东京有一个名为“汪道涵学校”的学习会，由见过汪道涵先生，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的著名学者组成。主要成员有大和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宫崎勇、日本兴业银行顾问小林实、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调查部长竹内宏等。这是我第一次从日本友人口中了解到汪老在日本的崇高声望。

我担任日本学会秘书长后，多次参加汪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方编译所等单位召开的座谈会，聆听他对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系列指示。汪老强调，研究日本一定要注意搜集和了解第一手资料，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不云。事实上，汪老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注重调研日本政经动向的

故，没有争吵，娜塔莉只是平静地说：“我还以为你仍爱着我。”电影里两个场景，表达娜塔莉内心真实感受。一个是：丈夫表示歉意留下的花，被她扔进垃圾箱，却不忘拿回装花的塑料袋——花比不上塑料袋珍贵，可见她对丈夫的怨恨；另一个是：她回想布列塔尼的岁月，在丈夫父母留给他们的家里，她度过所有的假期——花园里，有她亲手栽种的植物；海滩，见证孩子渐渐长大……和这个美丽的地方割舍，对她来说，也许有点残酷。

娜塔莉会把她的感触，说给学生听比安听，正是她的课，让学生发现了哲学，从而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而这个学生，也是她的自豪。但师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念上有了分歧。娜塔莉希望学生看重生命的价值多一点，坚持认为生活须与思想合一，而法比安对老师说：“你只在意每天的生活举止，不让你它损害及你的价值标准；你无法接受让思想失控进而导致你生活的巨大改变。”他不知道，老师年轻时

们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徜徉在春天的紫藤公园，紫藤花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翠叶婆娑，像绿云下飘逸的彩霞，蔚为壮观。晴空暖阳下，那盈架满棚的一束束紫藤花犹如浮起的彩云，又如缠绵的彩雾，倒映在横卧园中葫芦形的荷花池碧波里，恍若仙境般梦幻景致，艳丽夺目。放眼远眺，好像那儿有一片彩色的厚纱，盖住了绿色的枝叶；又如一只只美丽的彩蝶在飞舞，奇姿异态纷呈；更似一道彩色的瀑布奔泻而下，流光溢彩，极富活力与动感，令人心情悠然，乐而忘归。

紫藤花，她从不禁锢自己，有花尽情地开，有香尽情地放；紫藤花美得自然，美得朴实，美得芬芳，赏之悦目，闻之沁心。

书法 林仲兴

典范。在汪老身边工作的葛伟昌同志经常拿一些日本朋友赠送的最新书籍让我们摘译后送汪老。我也去过汪老办公室和医院病房为他讲解日语书籍。根据汪老的建议，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合著的《冷战以后》、前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所著《日本改造计划》、著名政论家本泽二郎撰写的《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等日本的畅销书先后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在翻译这些著

海派特色的日本研究

吴寄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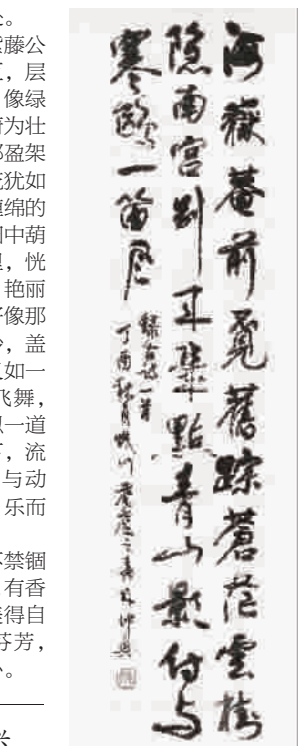
作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日本政经动向的了解。

汪老强调，上海的日本研究要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发展有海派特色的日本研究。1993年7月13日，汪老亲临上海市日本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语重心长地勉励与会代表要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去把握大的方向，勇于创新，努力提高日本研究的水准。1994年11月19日，汪老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强调，要把日本研究作为一个大课题来对待，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有了解，同时也要注意纵向的发展，善于把握日本从

思想其实也很激进。

这部讲哲学老师的电影，有时，用哲学书里的引语，表达她的思想和情感状态。在母亲的葬礼上，她读了帕斯卡尔《思想录》里的一段话：“我现在的处境是，不知我是谁，也不知该怎么做，我既不知我的情况，也不知我的责任，我全心期待至善，并且追随它……”伴随着画外音，紧接着的画面里，是她坐在公共汽车里悲伤地流泪，这不正是现实生活中她的写照吗？经历了所有一切，课堂上，她讲解着卢梭的《新爱洛漪丝》：“不幸是属于那些没有欲望的人，希望比拥有更容易令人满足……”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另一种期许呢？

电影结尾，娜塔莉抱着刚出生的外孙，唱道：“在明亮的清泉旁，我独自去散步，我发现水如此清澈，于是跳进去游水，我爱你很久了，而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唱吧，唱吧，你有一颗开怀的心，你的心会笑，而我的却想哭。”过去的冷暖甘苦，唯有她自知；至于将来的事，又有谁知道呢？



20世纪到21世纪的发展脉搏。

1995年夏，我在东京大学进修期间，汪老让一位旅日传媒人带信，要我注意搜集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资料，加强对这部分政治家的跟踪研究。同年10月，我回沪后向汪老汇报了调研的进展。汪老指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一现象和日本所处的国内外大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新生代政治家掌控最高权力后，势必会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带来深刻影响。汪老要求我先写好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研究的“总论”。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写好“分论”。他强调，对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研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务求客观、准确。说到兴头上，他随手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下了“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12个字送给我。

正是在汪老的勉励下，我开始了历时6年的调研和写作，终于在2002年夏，将《日本新生代政治家——21世纪“日本丸”掌舵人》一书奉献给了广大读者。

明日向你介绍上海市台湾研究会。

“学会”之歌 责编：刘芳